

论 刘 縯

曾 维 华

刘縯(?—23年)字伯升,西汉末年南阳郡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系汉高祖刘邦九世孙,汉光武帝刘秀之兄。他在历史上算不得一个重要人物,但是在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的高潮中,他曾组织了一支武装投入了绿林农民起义军的反莽斗争行列。长时期来,对刘縯的评价褒贬不一,其关键是如何看待刘縯反莽的性质,因此,对刘縯仍有研究的必要。

(一) 刘縯反莽思想的形成,是与王莽篡权,刘氏宗室的社会地位变化直接相关的。

刘縯大约生于西汉末年成帝元延、绥和年间^①其父刘钦曾任汝南郡南顿县县令,在他十多岁时其父去世(卒于平帝元始三年,即公元3年),后由其叔父、萧县县令刘良抚养。虽然西汉末年由于汉王朝的残暴统治,各地人民反抗斗争不断涌现,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也不断发生,整个西汉王朝的统治日趋衰弱,但就刘氏宗室来说,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并没有受到影响,即使在王莽摄政年间,王朝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也曾给刘氏宗室比较优厚的待遇。刘縯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

到了公元九年,王莽依靠外戚集团的势力,正式夺取了帝位,建立了新朝统治。然而王莽称帝后不久就废除了刘汉宗室的官爵,并限刘氏当官。这一变化,对刘氏宗室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刘縯已二十多岁。据史书记载他是一个“不事产业”、“性刚毅、慷慨有大节”、“好侠养士”力图在政治上奋斗的人,而且曾在都城长安“习《尚书》、《春秋》”,见过一些世面。这种政治形势的剧变,对他仕途发展设置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于是引起了刘縯对王莽统治的不满。他“常愤愤,怀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英俊”,以反抗王莽的统治,企图重建刘汉王朝的统治,恢复刘氏宗室原来所享有的优厚地位。可以说这也是刘縯反莽思想产生的主要原因。

但是,刘氏宗室虽然在政治上、经济上遭受王莽政权的排挤、打击,但其经济地位并没有一下子

衰落。例如刘縯家,即使在“天下连岁灾蝗”、“南阳荒芜”的情况下,仍能“卖谷于宛”,有余粮出售。因此,刘縯尽管具有强烈的反莽复汉思想,但在绿林赤眉农民起义爆发之前,始终没有公开起兵反莽的行动,这显然与其仍具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分不开的。

(二) 刘縯起兵反莽是在绿林农民起义军的强大攻势下促成的

公元十七、十八年间,由于王莽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脱离社会现实的政策,加剧了社会的阶级矛盾,造成了“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②的局面,终于爆发了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

由于农民军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步北上,直接威胁了刘縯的家乡——舂陵乡(在随县北边不远的蔡阳)。刘縯在面临“家欲危亡”的情况之下,从当时“王莽暴虐,百姓分崩”,“枯旱连年,兵革并起”的动乱形势中,预感到“王莽败亡已兆”,正是起兵反莽“复高祖之业”的大好时机。当然,如果这时不起兵,一旦农民军来临,他这位豪强地主之家,也必定是农民军打击的重要目标。于是刘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怀着投机的心理,“分遣亲客,使邓晨起新野,光武(即刘秀)与李通、李轶起于宛,伯升自发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拉起了一支武装,号“舂陵兵”,投入了农民军反莽斗争的行列。

这里应指出,有人肯定刘縯,说:“刘縯坚决

^①关于刘縯的年龄,史书无明确记载,但史书所载刘縯家除姐妹外,有兄弟三人,即刘传、刘仲、刘秀,而刘秀生于前6年,既然刘縯是刘秀之兄长,那么至少要比刘秀大4岁左右。因此,刘縯大约生于成帝元延、绥和年间。以下年龄均按此推算。

文中所引资料凡不注出处者,均见《后汉书·齐武王刘縯传》、《光武帝纪》、《刘玄传》、《王常传》、《李通传》、《赵孝王刘良传》、《刘晨传》、《顺阳侯刘嘉传》、《阴识传》、《王霸传》

^②《汉书·食货志》(下)

反莽，拉起了南阳第一支反莽武装^①。这是不对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南阳为郡名，治宛（王莽时曾称宛为南阳，而《汉书》仍用西汉的名称），当时绿林农民起义军的根据地就在江夏郡、南阳郡、南郡交界处，在绿林军初起时南阳郡就有贫苦农民投奔起义军，如绿林军的将领马武就是南阳人。如果说这仅是个人的话，那么南阳郡随县平林人陈牧、廖湛所率平林兵响应新市兵反莽树，是在公元二十二年七月。而刘縯在春陵起兵则是在新市、平林合军后的十一月，即使以刘秀起兵于宛的时间来看，也是十月的事，均迟于平林兵响应新市兵三、四个月，因此不能说刘縯拉起了南阳第一支反莽武装。

（三）刘縯率领的是一支地主武装，投靠农民军是想利用农民军的力量以实现“复汉”的政治目的。

刘縯的反莽队伍是一支与农民军性质完全不同的地主武装。从其成份来看，绿林军除了个别人以外，基本上都是贫苦农民，而春陵军的主要骨干和基本队伍则多为刘氏宗室、豪强地主、富商大贾及其所属宾客。如刘縯起兵时，除他本人及刘秀外，主要骨干分子刘嘉、刘稷是刘氏宗室，李通是“世以货殖著姓”的富商，起义时是“居富逸，为闾里雄”。李轶是李通的“从弟”，邓晨是“世吏二千石”，起义时仍“家自富足”，而刘縯所率部众则是“亲客”和“春陵子弟”。另外，阴识为“（汉）光烈皇后之前母兄”，在刘縯起兵时，也“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诣伯升，伯升乃以识为校尉。”王霸“父为郡决曹掾，霸亦少为狱吏”，亦率“宾客”投奔刘縯。

另外，刘縯起义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复高祖之业”，要恢复刘氏封建王朝的统治。而农民军初起时则是为了争取最低的生存条件，虽然后来受到“复汉”思想的影响，也打起了“复汉”的旗帜，但是农民军的“复汉”是与自身的要求揉合在一起的，与春陵兵“复汉”是完全不同的，这在后来的“立帝”斗争中明显地反映出来。

刘縯虽然拉起了一支地主武装，但是这支武装不仅人数少，只几千人，而且都是一些在初起时“恐惧，皆亡逃自匿”的贪生怕死之輩。刘縯要凭借这支武装是根本无法与王莽官军相抗衡的。因此，刘縯起兵首先就派遣其亲信刘嘉“往诱新市、平林兵王匡、陈牧等”，企图把农民起义军纳入他的麾下，以实现他们“复高祖之业”的目的。由于农民军一方面受到当时“复汉”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刘縯的春陵兵在反莽这一点上与农民军是一致

的，对农民军来说，反莽力量大一些总是好的。于是农民军采纳了春陵兵的建议，与之结成了暂时的反莽同盟。

但是刘縯的春陵兵纪律松弛，战斗力差，无法与农民军在战斗中合作。例如在唐子乡战斗中，他们就多占缴获物，以致“军中分财物不均”。绿林军对此非常“患恨”，准备“反攻诸刘（即春陵兵）”只是刘秀交出了所占财物才得以平息。后来在“与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战于小长安”时，春陵兵遭“大败”，结果连刘縯的姐姐刘元，弟弟刘仲及其宗族数十人也战死，使得农民军也受连累，只得“还保棘阳”。这时“新市、平林见汉兵数败，阜、赐军大至”，便准备甩掉春陵兵而单独行动。

面对这种情况，刘縯“甚患”。他知道，一旦被农民军抛弃，春陵兵不仅无力抵挡王莽官军，更无法实现“复汉”的政治目的。正在十分忧虑之际，由王常、成丹、张卬率领的下江兵为严尤、陈茂所败后，收散卒五千转战至南阳宜秋。刘縯便亲自与刘秀、李通“俱造常壁”，一方面“说以合众之利”竭力鼓吹“百姓思汉”、“刘氏复兴”的思想，另一方面对王常进行许愿收买，说什么“如事成，岂敢独殒之哉”。言下之意就是只要恢复了刘汉天下，总会有你王常一把交椅的。于是王常与刘縯私下达成了合军的协议，但是这个协议遭到了农民军将领成丹、张卬的反对，并认为“大丈夫既起，当各自为主，何故受人制乎？”然而这时王常“心独归汉”。结果在王常的劝说下，农民军将领才同意与春陵兵继续合军。

对于这次合军，有人以为：“这时起义联军内部动摇，刘縯从大局出发，耐心说服新市、平林兵，打消了他们散伙的念头，同时又劝说绿林军另一支下江兵王常部前来汇合”。^②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实当时的情况是农民军的力量大大强于刘縯的春陵兵，史书记载，当时农民军不愿意合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见汉兵屡败”。某种意义上说，春陵兵在当时已成为农民军的一个包袱，因此，继续合军实际上是在刘縯等人的再三要求之下，而农民军受了“复汉”思想的影响，容忍了（或说收留了）春陵兵。

^①见《东岳论丛》1982年第五期，申春生《刘縯的历史功绩应当肯定》

^②见《江淮论坛》1982年第1期陈双奇《应当正确评价刘縯》

(四) 刘縯被杀,是在反莽斗争不断深入,刘縯自恃在起义军中“威名益甚”的情况下,与农民争夺领导权的结果。

继续合军后,由于“诸部齐心同力,锐气益壮”。地皇四年(公元23年)起义军打败王莽的甄阜、梁丘赐部后,队伍空前壮大,“众至十余万”。但是尽管人数众多,却还没有建立政权,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文号、旌旗、表帜”。①为了把反莽斗争推向深入,农民军“诸将会议立刘氏以从人望”,实行统一领导,指挥各部的反莽斗争。但是在到底立谁为帝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当时以舂陵兵的头目和个别被刘縯等收买了的农民军将领王常等一批所谓“豪杰”,“咸归伯升”,主张立刘縯为帝。而以王匡、王凤、张卬为代表的大部分农民军将领则主张立刘玄为帝。

针对这种情况,农民军将领们不顾所谓“豪杰”们的反对,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办法于这一年的“二月辛巳”,②在清水沙滩上建立了以刘玄为帝、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鲈为大司马、陈牧为大司空,其余被封为“九卿”、“将军”的更始政权,“然后使骑召伯升,示其议。”虽然“复汉”、“当皇帝”是刘縯的志向,又有“豪杰”们的拥护,但是其实力远不及农民军,因此当他得知农民军的决定后,也不便公开反对而自争帝位,便说:“诸将军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见,窃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众数十万,闻南阳立宗室,恐赤眉复有所立,如此,必将内争。今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损权,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号,鲜有能遂,陈胜、项籍,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为功,遽自尊立,为天下准的,使后人得承吾敝,非计之善者也。今且称王以号令,若赤眉所立者贤,相率而往从之,若无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愿各详思之。”话说得似乎很诚恳,也很婉转,但意思很明确,就是现在立帝为时太早,而且刘玄也不行。其实这是刘縯想搞的拖兵之计,企图等自己的实力强大起来之后,由自己来当皇帝,只是这个意思没有说出来罢了。当时一些农民军将领未能看透刘縯的用意,“多曰‘善’”,赞成刘縯的建议,但是“将军张卬拔剑击地曰:‘疑事无功,今日之议不得有二’”。坚决通过了原定方案。

有人认为刘縯当时并不想当皇帝。③这不是事实。刘縯还在起兵时就提出,要“复高祖之业,定万秋之世”,并自称“柱天都郎”。当他去拉拢王

常合军时所说:“如事成后,岂敢独擅之哉。”就是事成后当皇帝的口气。在围攻宛城时,又自称“柱天大将军”。在立谁为帝时,所谓“豪杰咸归伯升”,正说明刘縯是“豪杰”拥戴的人物,这点刘縯当是清楚的。后来刘年的亲信刘稷在反对更始政权时则说得更为明确,“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邪”。可见他们在初起之时,就已明确要拥刘縯为帝,而刘縯也一直是这批“豪杰”的代表和首领,他怎么会不想当皇帝呢。

有人并以为:“即使他(指刘縯)真想当皇帝也未尝不可。他与刘玄既然同是刘氏宗室,为什么刘玄能当,他就当不得?起码他比刘玄更有当皇帝的资格。问题并不在于他是否想当皇帝,而在于当他未当上皇帝之前对农民起义的发展是否起过破坏作用。”④这种看法实属苟同。选择刘玄还是刘縯当皇帝,是关系到把农民军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农民军拥戴刘姓,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但是在刘姓中进行选择,则反映了农民军的思想和要求。刘玄是只身投奔平林军的,在平林军中仅充当安集掾的小官,而且刘玄为人“素懦弱”,农民军拥立刘玄,实际上是以刘姓为号召,充当傀儡而已,其主要领导权仍然控制在农民军手中,而刘縯则不同,他不仅拥有一支地主武装,而且一直是地主分子所拥戴的人物,即使王莽的地方官吏也愿投归刘縯,如“平林后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得司徒刘公(指刘縯)一信,愿先下。’”结果刘縯一到“即开城门降”。其实刘縯等根本就没有诚心与农民军合作,如舂陵兵的骨干分子李軼,因与“更始贵将”(原注:贵将朱鲈等也。)关系较好,刘秀便对其“深疑之”,并且“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复信’。”可见他们与农民军界线之分明,防备之严密。如果一旦让刘縯当皇帝,就等于把农民起义的果实全部奉送给了一批地主分子,因此,在农民军看来刘玄当然比刘縯更有资格(这个资格的标准应由农民军来判定)当皇帝。至于在选择皇帝之前,刘縯是否对农民起义有过破坏作用,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不能随便断言,但是对于刘縯在与农民军合作反莽中的所作

①《汉书·王莽传(下)》。

②《后汉书·光武帝纪》及《刘玄传》记载为:“二月辛巳”,然《汉书·王莽传》记载为“三月辛巳”,待考。

③见《东岳论丛》1982年,第五期。
见《东岳论丛》1982年,第五期。

所为的认识，当时的农民起义军要比我们今天清楚得多。

刘縯与农民军争帝失败后，被任命为大司徒，使得混迹在起义军队中的“豪杰失望，多不服。”当然这场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

更始政权建立后，即领导、指挥了宛城、昆阳两大战役，基本上摧毁了王莽官军的主要力量，为推翻王莽统治奠定了基础。但是，反莽斗争的最后胜利被农民军夺取，这是以刘縯为代表的“豪杰”们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他们自恃在宛城、昆阳两大战役中的功劳和“威名益甚”，向更始政权进行了公开的挑衅。

六月中旬，刘縯的部将刘稭首先跳出来反对更

始政权，宣称“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指刘玄）何为者耶？”并且公开拒绝更始政权所给予的任命。而对刘稭的公开挑战，刘玄及农民军将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把刘稭抓了起来，“将诛之”。这时刘縯看到自己的亲信将被杀，便亲自出面“固争”，坚持为刘稭辩护，激起了农民军将士的极大义愤，在农民军将领的主张下，刘玄下令处死了刘縯、刘稭，于是刘縯在历史上的活动也就结束了。

总之，刘縯反莽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农民军杀掉刘縯，实际上是清除了起义军队中的一大隐患，因此，我以为刘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是不值得肯定的。

（上接第115页）

‘欺饰冒功，情殊可恶，、‘辜负朕恩，自取罪戾’的看法，没有对达、姚治罪”。这一段话，除了讲穆彰阿于该折中没有提出任何惩办达、姚的意见这一点是合乎事实的以外，其它全是对该折的误解。因为在这个奏折中，穆彰阿除了仅仅将达、姚的亲供“恭呈御览”之外，通篇没有加上一句他自己的按语。《异议》所谓怡良的孟浪、台湾军民抗英实情、达姚在台功绩、璞鼎查借端请诉等等，都是达洪阿、姚莹自己在供词中所陈述的。这从该折末尾以“所具亲供是实”一语作结可资确证。前引咸丰帝《朱谕》指责穆彰阿说：“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尽力，有碍于己，必欲陷之”；《中西纪事》所载：“台湾之狱，外则耆相主之。内则穆相主之。怡制使之查办此案，以‘莫须有’三字定讞，固由伎功，亦奉政府枋臣指授也”；跟《异议》的论点是恰恰相反的。即使撇开这一点不谈，《异议》所谓穆彰阿积极支持达、姚，以及由于他“为之开脱”，道光帝才“没有对达、姚治罪”等等，也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一个自号赘漫野叟的人写了一本《庚申夷氛纪略》，记述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情况。书中于感慨国事蜩螗之余，抚今追昔，对鸦片战争时期的人物发了一通议论。他写道：“国家祸乱，至斯极矣。追思致乱之由，初作难者，以林则徐为首，而成之者裕谦也，……参之肉其足食乎！其善为抚驭，消患于未萌者，以钦差大臣大学士两江总督讳伊里布为第一；大学士侯爵两江总督讳琦善次之；大学士两江总督宗室讳耆英又次之；赞襄枢密，始终其事，任劳任怨，安天下者，则军机大臣大学士讳穆彰阿一人也”^①。这一贬一褒，显示了作者的鲜明投降主义立场；同时，它也表明，穆彰阿在他的心目中，同伊里布、琦善、耆英原是一流人物，而且是为卖国投降事业“始终其事，任劳任怨”，出过大力。这番议论，或许从反面对于我们评价穆彰阿也有那末一点启示作用。

^① 《第二次鸦片战争》丛刊（二），第12页。